

編者的話

中國古典文學發展史上與西方有一大迥異之處，在於中國並沒有專業的文學家。西方文學家如杜斯妥也夫斯基或大仲馬，畢生以撰寫小說為業。在中國，專業寫作是不能維生的。像老舍及茅盾這些多產作家，是二十世紀才出現的新時代人物。在此以前，甚少作家會在一生中撰寫超過一部作品。

遇上現實與盼望相違背，而寄情於文學及藝術，求取補償，是人們最常見的逃避方法。（佛洛伊德在這方面的偉大發現相信是讀者所耳熟能詳的。）

只是手段，言志才是核心。作者藉著其作品，抒發心中的理想及盼望。可以大膽說一句，中國的小說並不寫實，最起碼不是狄更斯那種新聞記者式的寫實。中國的小說所反映的並非世上真實的現況，而是人心真實的盼望。特別是經歷了二千年的禮教發

展，大多數中國人都不敢將自己內心的盼望輕易流露出來。假若這份盼望與現實境況的禮教相抵觸時，唯有寄情於文學之中，這也許是中國文學其中一個迷人之處。

讀者不難見到，封建家庭的家長不管在觀賞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的愛情故事時淚濕了多少條手帕，但回到家中談及自己子女的婚姻，卻依舊一派「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」。人們只能同情戲劇中的梁山伯及祝英台，現實中卻將所有爭取自由戀愛的男女打

成「無媒苟合」。

文學中的《西遊記》，充滿「悲劇英雄」的味道，主角孫悟空常是受主子（唐僧是這方面的代表）的誤解，故事結局往往是誤會冰釋；悟空得直而告終。這份渴望有一天得到主子諒解及重用的心態，不正是現實中許許多失意於仕途者的内心反響嗎？

與西方文學不同，《威廉泰爾》的故事促成了瑞士人的俠義精神。相反，儘管《水滸傳》在坊間大行其道，但《水滸傳》的俠盜精神在中國卻並沒有市場。這份俠盜精神絕不切合中國人「各家自掃門前雪」的心態，卻正好成為怕事苟且之餘的鎮靜劑；讓我們相信儘管自己窩囊一生，但世間行俠仗義的人仍有的是。

這些中國文學作品，都可以說是人内心深處受壓抑的欲念的迴響。所以，要了解一個中國人的内心盼望，文學相信是一個極佳的入門檻。故此，今期《鼎》特別選刊了兩篇探討中國文學與宗教關係的文章。白保羅先生從幾近佚傳的《續西遊記》，

分析了中國人接受佛教時的局限，以及這部小說在心底裡與公教信仰的共通之處。Robert Paul Roth 則泛論中國文學中含有的宗教意味，並比較中西方文學的異同。兩篇文章都值得讀者細心欣賞。

談到中國文化的接觸，陳明生先生所著的「李之藻信奉天主教的緣由探考」，帶領讀者回到中西文學接觸初期的歷史中。文章內所述不同人士對李之藻奉教原因的不同解釋，本身也反映出中西文化的分異。

除了橫向的中西文化歷史接觸之外，羅國輝神父亦為我們講述了中國教會禮儀歷史的縱向發展，從過往而至今日，再展望未來，在中國教會全力推行禮儀改革的前夕，這篇文章更顯得別饒意義。

大埔堂區是香港最古老的傳教站之一，一百三十年綿延不斷的歷史得來不易，今期特以圖片專輯向讀者介紹。

新歲伊始，祝各位萬事如意，如天主之意。